

唐太宗的文艺观及诗歌创作初探

李 中 华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一位功业卓著的帝王。他不仅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还以其诗作揭开了唐诗风流的篇章。唐太宗处在梁陈以来浮艳柔弱的诗风向唐代刚健宏阔的诗风转变的时期,他的诗风,既是对前朝诗风的纠正,也是对唐代诗风的开创。正如《全唐诗》(卷一)所评说,李世民的诗“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然而,以前的文学史家对李世民诗歌在唐代诗坛的地位,却肯定的少,贬责的多,认为他喜爱齐梁文风,指责他的诗是“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富丽呆板的宫廷诗”,并且把初唐的齐梁遗风,归罪为李世民欣赏和提倡的结果。其理由有二:一、贞观宫廷诗坛多前朝旧臣;二、李世民曾“戏作艳诗”,又有一首“戮庾信体”的诗作传世。

其实,这并不足以否定李世民的诗。贞观诗人中多前朝旧臣,然而由于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刷新,因而诗坛呈现新的气象并非不可能的事情。至于他“戏作艳诗”一事,据刘肃《大唐新语》记载:太宗曾“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若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匹”^①。单凭这段史料,不足以作为李世民崇尚宫体、诗风淫靡的明证。对此的一切怀疑,只要联系李世民的文艺观来分析就可涣然冰释。

李世民的文艺观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就是重视诗歌言志的功能与教化的作用,

也就是要求文艺有益于劝诫,可裨于政理。他说,自从秦始皇焚毁典籍以来,“雅道沦丧,历兹永久”,所以后世新声竞作,斯文将坠。弘扬三代大道,振兴古典风雅,就成了他的理想^②。他在《帝京篇序》中还说:“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英。”这里的“咸英之曲”,指三代古朴的政教及文化,而“烂漫之音”,则是指秦汉以来滋长的侈丽淫放的文风。他曾批评汉代一些大赋“文体浮华,无益劝诫”^③,就是这个原因。

当李世民用这种文艺观去透视梁陈诗坛时,他的态度就很明确了。他批评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说“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足为鉴戒”^④。又据记载:“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天下笑,非所须也。又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⑤。这些地方,李世民都明确表示,要以梁武帝、简文帝、陈后主、隋炀帝为戒,要修德治国,有益于人,而不追求词藻浮华、表面艳丽的文章。

李世民的文艺观,还可以从贞观年间奉诏修撰的几部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得到印证。贞观十八年,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撰《晋书》,李世民亲自写了四篇论赞,并总题全书曰“御撰”。在《晋书·文苑传叙》

中，极力推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说道：

当涂革命，文宗郁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彬蔚之美，竞爽当年。独彼陈王，思风道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

在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中，则批评梁陈诗风说：

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遘漂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

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亦说：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房玄龄、魏征、李百药等都是李世民的亲近大臣。他们奉诏修史，其总的思想旨趣必然与李世民一致。由此也可以看出李世民文艺观的基本倾向。

李世民的这种文艺观对于初唐开始的诗歌革新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初唐四杰的某些议论，与李世民如出一辙。杨炯《王勃集序》对于前朝诗风的评述，简直可以看作是对李世民《颁示礼乐诏》中同类论述的改写。杨炯还认为初唐文体的败坏并非在太宗贞观年间，而是高宗龙朔年间的事。他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内兴文事，“变风变雅，主体不拘一途；既博既精，为学遍游百氏”。李白在《古风》中，也唱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对于贞观时期的创作，卢照邻拟之为“变风变雅”，而李白称赞它“文质炳焕”，这些都是近于公允的评价。

应该看到，在反对梁陈宫体诗风这一点上，李世民与初唐四杰、李白等人是一致的。李世民所称的“雅道沦丧”，与四杰所说的“亏于雅颂”，与李白咏叹的“大雅久不作”，其内涵一脉相承。他们用以对抗淫放颓靡诗风的

办法也是一致的，就是要恢复古道。李世民说他“情深好古”，四杰说要“自我作古”，李白说“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举的是同一旗帜。概括地说，李世民的弘扬古道，经过初唐四杰、陈子昂、李白相继倡导，声势渐盛，波澜渐阔，终于在更深的基础、更大的范围内展开，汇成一股诗界革新的洪流，并且最终取得了成功。

李世民的诗，《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共存一百零二首。其中表现他剪暴弥乱的戎马生涯的诗，抒发他治国图强宏伟理想的诗，寄托他思贤求贤、警戒荒淫的情志的诗，以及展现中华民族亲密团结的动人情景的诗，具有突出的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

李世民描写战争的诗，格调高朗。历来写征战的诗，大都以主要的笔触去写战争的苦难或边地的凄苦荒凉，或沙场厮杀的惨重伤亡，或戎马岁月的倥偬艰辛，或思乡怀亲的悱恻哀怨。悲壮，是这类诗的主旋律。而诗中英雄主义的源头，常常是为着报效明主、梦想封侯、名垂青史，或是仗义轻生的侠士气节。然而李世民的这类诗却别开生面。他的诗充溢着磅礴奔腾、一往无前的气势与摧枯拉朽、整顿乾坤的精神，用语简洁，神情秀爽，英气勃然。试看下面两首：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伐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

《经破薛举战地》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旂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

《还陕述怀》

第一首诗回忆义宁元年迎击薛举势力的一场战斗，以惊电起、长河决、落星沈、横云裂比喻战事的激烈与严酷。这一战使薛军败北，武德元年再战便将薛的势力扫平，这就是诗中所说的“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第二首诗以中间六句隐括陕地战事，而以末二句

力承千钧作结。二诗境界之高、气象之雄、概括之深厚、承受之有力，显示了李世民作为一位青年统帅气度轩昂、乐观镇定的风姿，在亢奋激扬中又回荡着王者之风。这一点，只要仔细吟咏他的“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等诗句，就可以体味出来。

李世民这种高如朗日洁如霜的“济世”之心，不仅表现为战时的翦暴弥乱，也表现为平时治国兴邦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扫六合、清四海、一统环宇的“雄主”，并不乏其人；但在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能不矜功、不骄纵、不为至高无上的威权压倒，倒是极为罕见的。而这正是李世民高出秦皇汉武的地方。他在《登三台言志》一诗中，曾批评秦皇汉武为了一人“居奢”“骋丽”，役使百姓，大修宫殿。接着笔锋一转，抒发自己建国的抱负，写道：“岂如家四海，日宇罄朝伦？扇天裁户旧，砌地翦基新。引月擎宵桂，飘云逼曙鳞。露除光炫玉，霜阙映雕银。舞接花梁燕，歌迎鸟路尘。镜池波太液，庄苑丽宜春。……所欣成大厦，宏材伫渭滨。”李世民的理想是以天下为家，把环宇之内建得象皇宫苑囿一样，让民间的镜池荡漾着皇家太液池的波涛，百姓的庄苑和帝王的宜春苑一样美丽，以神州大地构筑一座空前的大厦，与民同享清平之乐。

当然，诗中所描述的境界是虚幻的。然而一个封建君王，有这种阔大的胸襟、与民同乐的理想，也是难能可贵的。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遭受战乱洗劫的神州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出现了历史上负有盛誉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出现，还由于李世民的求贤任贤、虚心纳谏。因此，对于贤臣良辅的思求在他的诗中经常的主题。看见山岩，他就想起商高宗曾举傅说于傅岩之下；看见田野，他又想起曾住在有莘之野的古代良相伊尹。他在诗中把实现自己的抱负比作横渡巨川和兴建大厦，将贤臣良辅比为舟楫和栋梁。

他在《春日登陕州城楼》一诗中写道：“迹岩劳傅想，窥野访莘情。巨川何以济？舟楫伫时英。”在《初春登楼即目观作述怀》诗中又写道：“连薨岂一拱？众干如千寻。明非独材力，终藉栋梁深。”他还曾对魏征诚恳地说，自己好比一块璞玉和矿石，如果不遇良工，便与瓦砾一样，倘有良工琢磨和锻炼，就可成为万代之宝。他说，魏征就是这样的良工。魏征死，他赋诗送葬，寄托哀痛之情。

封建集权制度本身产生着一种强大的堕力，帝王的腐化作为一种趋势，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性质。而李世民独能延缓它的进程，抑制它的势头，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由于他时刻记取前代君王荒淫误国的教训，用以警戒自己。他在《帝京篇序》中说：“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他还说，“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所以他要写诗“以明雅志”。他时常在诗中批评前代君王荒于淫游、迷于奢华、惑于求仙的行径，还经常反躬自责，检讨自己。他在《帝京篇》其十中说：“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黄。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在《登三台言志》中表白自己：“念劳惭逸己，居旷返劳神。”在《初春登楼即目观作述怀》中更警告自己说：“弥怀矜乐志，更惧戒盈心。愧制劳居逸，方规十产金。”这些诗句，都直吐胸臆，端正磊落，表明了李世民作为一个开明天子的宽阔胸怀。

李世民诗歌的又一个值得称道的内容是它记录了我国各民族亲密团结的动人景象。“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就是他的内心自白。在《执契静三边》一诗中，他主张处理民族关系要讲信义，言必信，行必果，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他经常忧虑自己的德政教化不能达到遐荒地区。他在《正日临朝》中说：“晨宵怀至理，终愧抚遐荒。”在《春日玄武门宴群臣》中又说：“粤余临万国，还惭抚八荒。”正是由于这种正确的

民族政策，所以贞观年间我国出现了各民族亲密团结、和衷共济的局面。李世民诗中，也记载了这些感人的历史场面：

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槐。

《幸武功庆善宫》

百蛮奉遐饗，万国朝未央……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

《正日临朝》

九夷饗瑶席，五狄列琼筵。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

《春日玄武门宴群臣》

由于政治清明，各民族和睦共处，亲如家人。边远民族的代表“梯山”、“驾海”来到京城，带来了自己的礼物，相会于皇殿之中，庆祝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

李世民诗歌的风格，前人或称“富丽”⑥，或称“丰丽”⑦，《全唐诗》谓为“沈丽”，这些都大致反映了他的诗歌的艺术风貌。其表现是以平整的格律、典雅的辞藻，表现一种高朗清和的情致。即使是他的效法庾信体的诗，也与梁陈宫体有着不同的气质。我们试看此诗：

岭衔宵月桂，珠穿晓露丛。蝉啼觉树冷，萤火不温风。花生园菊蕊，荷尽戏鱼通。晨浦鸣飞雁，夕渚集栖鸿。飒飒高天吹，氛澄下炤空。

《秋日敕庾信体》

全诗描写秋日景色，清和可赏。而末二句以秋风飒飒、一扫酷暑作结，隐寓他廓清妖氛、澄清天下的志向，使得全诗含蓄隽永、耐人讽咏，而与梁陈宫体自然异趣。

李世民诗有一种笼罩天下、涵盖六合的气度，这与他年少即怀壮志，志向宏阔是分不开的。诗意雄壮而又从容涵咏，所以他写战事则沈毅果敢、镇定自若。写抱负则思满天下、周及八荒。另一方面，他的诗又很讲究用词的典雅华美，这主要是时代风尚和他

个人的喜好所致。他在评价晋代诗人陆机、陆云时说：二陆“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迴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故固远超枚、马，高躅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⑧。二陆——尤其是陆机的文风，世称富丽繁缛，李世民对二陆的大力推崇，当然体现了他的艺术爱好。

李世民又是处在律诗逐步定型并趋成熟的时期。他的五言诗，属对工整，意境圆美，堪称唐代五律的元声。王夫之《唐诗评选》评他的《月晦》一诗曰：“只此是格，只此是韵！五言近体必从此种入，乃得不沦恶道！”又评《咏桃》诗曰：“绝代高唱，结语深炼，妙于淡合！”据此可以看出，对于律诗的形成与发展，李世民诗亦有着一定的贡献。

勿庸讳言，李世民诗也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后期写了一些反映宫中游宴行乐、节令转换的诗，内容单薄，缺乏社会意义。其二，他的诗形式略嫌单一，变化不多，某些诗兴象偏枯，理过于辞。其三，他的诗语言上过分讲求骈俪对偶，胡应麟认为唐代“律有余，古不足”，李世民有“兆端”之过，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些并不能淹没他的诗中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说，李世民的诗歌是唐诗登上峰峦之巅的第一级台阶，因此，应当给予公允的评价，以恢复它在唐代诗坛的应有地位。

注释：

① 《大唐新语》卷三。

② 《全唐文》卷六，《颁示礼乐诏》。

③⑤ 《贞观政要·文史》。

④ 《贞观政要·慎所好》。

⑥ 《诗薮》内编卷二，古体中。

⑦ 《唐音癸金》卷五。

⑧ 《晋书》卷五十四，《二陆传论》。